

“护鱼青年”，誓要“精灵”永留母亲河

本报记者韩振、张凌漪

■长江护鱼队

22 位老渔民和年轻人，组建了一支民间护鱼队——重庆鸿鹄护鱼志愿队

6 年来，护鱼队历尽艰辛，呵护着母亲河中的每一条“精灵”

7 月，国办印发《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的消息公布。相关部门紧锣密鼓，确保 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 10 年禁捕

10 年禁捕的通知，让重庆鸿鹄护鱼志愿队在这个不平凡的年份有了属于自己的不平凡

2020 年的盛夏，刘鸿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，个人的涓滴努力，也能与宏大的国家治理产生如此强烈的共振。

7 月，国办印发《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的消息公布。相关部门紧锣密鼓，确保 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 10 年禁捕。

6 年前，长江上非法捕鱼活动猖獗。“再这样下去，长江里的鱼要绝种了。”刘鸿看不下去，想着自己做古建筑生意有些积蓄，便自费购买装备，召集 22 位老渔民和年轻人，组建了一支民间护鱼队——重庆鸿鹄护鱼志愿队。

6 年来，志愿队在队长刘鸿的带领下，历尽艰辛，呵护着母亲河中的每一条“精灵”。10 年禁捕的通知，让他们在这个不平凡的年份有了属于自己的不平凡。

独当一面，不留情面

冬末山城，冷雨一连下了好多天。天擦黑，雨渐渐小了。

长江上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津段。志愿队的几个小伙子，踩着江边的鹅卵石，把 3 个装满汽油的铁皮桶搬上一艘 90 马力的快艇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刘鸿带着他的队员坐进驾驶舱。一脚油门下去，船尾翻滚起白色的浪花，快艇“嗖”的一声，急速向长江下游飞驰。

为了不影响视线，方便巡护，船舱没装顶棚。冰冷刺骨的江风，裹挟着空中的雨丝和舱底的细沙，一股脑扑在队员们的脸上、眼里，很快又顺着脸庞滴落了下来。他们的衣服早已被打湿。

雨水打在驾驶舱前的一小方玻璃上，形成一层朦胧的水幕。

34 岁的苏春坐在驾驶舱左侧的船舷上，目光炯炯，一面观察江岸四周是否藏匿着非法捕鱼者，一面不时用毛巾擦拭挡风玻璃，再将毛巾拧干。

苏春话不多，干起活儿来却很利索。

“我最看重的就是他不留情面。”刘鸿说，“要想加入我们队，有两条——信念坚定，抹得开面子。”

苏春老家在江津区石门镇白坪村。去年春节期间，他发现家正对门的江心岛——中坝岛上，有人影活动。定睛一看，有人在非法电鱼。苏春气不打一处来，当即给刘鸿打电话报告。正在家里陪客人的刘鸿一听，立马放下碗筷驱车赶过去。

为了不引人注目，两人借了江边村民用来种菜的两艘“烂木船”。苏春悄悄划到江心，走近了仔细一瞧，竟是住在自己对门的邻居。苏春一个跨步跨上中坝岛，一把把邻居摁到地上，亲手把邻居送进了拘留所。

“他家里派人前来说情，还要给我送礼，我当然



▲今年 7 月，重庆鸿鹄护渔志愿队年轻的队员们在长江上开展巡护工作。本报记者韩振摄

不能答应。后来我再碰到他家里人，也没觉得尴尬，还是照样打招呼，跟以前一样。”苏春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干这个就得拉得下脸！”

这件事以后，刘鸿就给苏春配了一只船，由他来当船长。

鸿鹄护鱼志愿队里，像苏春这样的年轻人正快速成长起来，他们构成了护鱼的中坚力量。仅今年上半年，志愿队已开展自愿巡护千余人次，巡护里程 1.9 万公里。

15 尾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鲟，8 尾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胭脂鱼以及数不清的各种鱼类，在他们的救护下，回归母亲河的怀抱。

战友，兄弟

与苏春同岁的陈江是护鱼队里的“老队员”，去年刚升任为副队长。志愿队成立之初，他在熟人的介绍下加入护鱼队。“朋友带朋友”，这是队里很多年轻队员的加入途径：这样加入的队员，人品有保证。

陈江是个包工头，平时事情也不少。但一有时间，他就到志愿队报到：“我就是想给自己的孩子，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。”

同护鱼队的兄弟们在一起，用陈江的话说，就是一种“志同道合、惺惺相惜”。

有一次，巡航半途遇到瓢泼大雨，但船舱上只有一件雨衣，大家你让我、我让你，最后谁都没穿。

还有一次，电鱼的人被发现后，背起电鱼设备跳下了水，准备逃到对岸去，电鱼的人穿着水裤，水很

快漫过了他的胸部，钻进了水裤里，他的身体迅速往下沉。

志愿队护鱼，必须要确保非法捕鱼者安全。最先看到的队员不假思索，跳到水里就去拉他，但怎么拉都拉不出水面。这时，第二名队员、第三名队员纷纷跳入水中，大家齐心协力才把对方拉了上来。对方上岸后，队员们把他交给了公安机关。

兄弟间的情绪会互相传染。一度，有队员因为受了委屈，不想再坚持下去了，但群众举报电话一打过来，一听到群众满是期盼的话语，队员们又都受到了鼓励，重新燃起了斗志。

今年，长江开启禁渔新政，干流尤其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点水域，实施为期 10 年的常年禁捕，渔民纷纷转产上岸，渔政部门也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，志愿护鱼队员们有了更多的依靠。

“几年下来，长江的变化我看在眼里，感动在心里。”陈江说，“江里的鱼越来越多了，甚至有几次扑通扑通跳到了我们的船上，像是在给我们打招呼，向我们问好。”

敌人，朋友

“在那边！”坐在船舱最右侧的何勇突然大叫一声。循声望去，暗夜的夜色里，一位头戴斗笠、身披蓑衣的垂钓者，站在离岸不远的礁石上，手持两柄大“海竿”，正借着夜色的笼罩垂钓。

这种大“海竿”，上面带有很多钩，路过的鱼儿碰

足迹遍布全国 24 个省份、近千个村庄，收集了 3800 余份水样检测数据，正在“绘制”中国水质地图。

“最初希望更多青年人参与，走进乡村带动村民与公众，一起关注农村水安全问题。当时还没有更长远的规划，只是觉得这件事有意义。”谈及发起“中国水质地图平台”的初心，任晓媛坦言。

2015 年，高中毕业即赴美留学的北京姑娘任晓媛，已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环境工程专业研究生，在这个创业氛围浓厚的校园，她设想创建一个中国版的乡村水质地图。

而这源自于她与水结缘的一系列故事。她曾参与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的调研项目。“在海上那三周整天跟水在一起，感受着水这种万能溶剂，逐渐被它的包容性所感动。”任晓媛说。

在那之后，她把视野聚焦在乡村和发展中社区的水质现状。她到印度调研水质数据库。“很多民间组织会通过水质数据库规划公益目标，政府也认为数据库很有价值，但可能没有最有效地利用。”她说。这项研究给了她很大启发，促使她关注中国广大乡村的水质问题，而网上又查不到相关数据。

不久后，她在学校和国内社会组织支持下，远程发起了“吾水信息平台”项目，寻找国内关注农村水质的青年志愿者，收集、检测乡村水质数据。

硕士毕业后，她决定回国投入“吾水信息平台”建设，这也改变了她曾经设想过的人生轨迹。“本来在美国找工作、拿着不错的薪水，买个大房子，周末去滑滑雪，生活也不枯燥。”

如今，任晓媛也看到水质地图背后的新挑战。由于没有聚焦哪一个流域的具体问题，这种分散式的水质检测，很难形成系统化的分析成果。

“我们能在数据中初步分析，有多少人担心喝的水有问题，多少人喝着未经净化的水，可能会有一些百分比的趋势，但如果没有聚焦到某个地方的具体问题，这些水质数据能产生的意义和价值都是不够的。”任晓媛反思道。

新的一年，她计划通过与高校的联动，深入挖掘水地图的数据价值，形成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。

未来想让更多村民喝上健康水

坐在记者面前的任晓媛，脑袋里装着一长串关于水的故事。在她的讲述中，水质地图背后的乡村水安全案例，被一层层揭开。

她总会说起一次难忘的对话，在乡村调研时曾问村里孩子们，水是什么颜色？回答有黑色、黄色等，却没有一个孩子意识到，水其实没有颜色。

团队成员朱迪听在一个村庄发现，村里过滤饮用水的设备，只是蓄水池旁一个扎满孔的矿泉水瓶。

这些经历让任晓媛重新思考做公益的方向。

“我们组织志愿者到农村检测水质，建设展示水质数据平台，但并没有想清楚，到底能为乡村解决什么实质问题。村民也觉得，我们做的事对他们的生活，

到，即便侥幸逃脱，也会伤痕累累，早已经被禁止在长江上使用。

刘鸿迅速将船停到礁石前。何勇一个跨步跳上前，把垂钓者的鱼竿收走“代为保管”。

“80 后”何勇还是护鱼队里的“编外人员”，与护鱼队不打不相识。

第一次是因为嘴馋。他向非法捕鱼者买了 5 条江团，不曾想线人给护鱼队打电话，鱼被缴了，何勇跟“鸿哥”保证：再也不敢了。

第二次是因为打鱼。他用网眼细小的蜜网捕鱼，又被护鱼队抓了个正着，鱼没有网到，还被判了几个月刑。

“鸿哥当时可气了，吼我‘嘿，怎么又是你！’”何勇不好意思地挠着头说。

在牢里，何勇进行了深刻反省。出来后，何勇天天打电话给“鸿哥”说情，申请加入志愿队。但因为非法捕鱼的前科，“鸿哥”硬是不同意。

何勇不死心，一有空就来帮忙。一来二去，何勇和志愿队里的队员成了朋友，凭借自己非法捕鱼时积累的经验，帮志愿队立下了不少功劳。

师傅，徒弟

江面完全笼罩在夜幕里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只听见快艇的马达在轰鸣。

小伙陈亮拿出手电筒向四周扫射、警觉地查看江面。

他是队里最年轻的队员，今年才 25 岁，也是刘鸿最小的徒弟。陈亮从小在江边长大，踢足球、抓螃蟹是他的童年记忆。近年来，江边的螃蟹少了，他决心通过保护，把长江上的螃蟹找回来。

和其他年轻队员一样，陈亮刚来时，是跟着师傅和老队员一起巡航，打击非法捕鱼是个技术活，取证、收集资料，样样都有大文章。师傅和老队员们一点点传授经验，从熟悉航线和江水下的礁石，到辨认各种珍稀鱼类，他一点一滴地认真学习。

队员们每次向下游巡航 100 公里到珞璜，大概花费三到四个小时；向上游巡航一直到四川边界，到了边界就用江水洗洗脸，在那里歇一晚。巡护很艰苦，但陈亮没有丝毫怨言。

“过去，每次出来巡护，都能收缴很多捕鱼网，根本不愁碰不到非法电捕的人。”陈亮说，今年以来，沿江各地投入了更多人员，更先进的设备打击非法捕鱼，江上的捕鱼网少了，非法电捕鱼的人更难碰到了。

叮铃铃，陈亮的电话响了，是母亲。“不回来吃晚饭了，正出任务呢。”陈亮匆匆挂断母亲的电话。

夜更深，风更冷，雨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。不知不觉间，快艇将城镇甩在身后，那是队员们的家乡。城镇里，灯火阑珊，暖意绵绵。

但这群年轻人，他们的今夜在雨里，在江上。

“地球卫士”，想让村民喝上健康水

本报记者完颜文豪、张典标

■任晓媛

从事农村水资源保护与净化工作的“90 后”青年

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全球 7 位 30 岁以下科学家、工程师、企业家和活动家 2020 年“地球卫士青年奖”

回顾 2020 年，新冠肺炎疫情是无法绕过的关键词。人们在合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后，也在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其中健康变成尤其重要的主题

一位“90 后”姑娘正在带动更多青年力量，将视野聚焦到国人的饮水健康，投身一场以改善水质为目标的乡村实践

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清晨，任晓媛匆忙走进北京北三环一栋居民楼。16 层的一套房屋内，她的团队和一个环保组织，合着用略显局促的办公场地。

“走通模式、沉淀数据、路演募资……”这个出生于 1991 年的北京姑娘，语速飞快，行事干练，连珠炮般的讲述，搭配丰富的表情，传递出一名公益创业者特有的激情。

今年初，新冠疫情暴发，各行业都受到不小冲击。以前捐助给任晓媛团队的企业资金，基本都压缩预算或投入抗击疫情中。“当时非常担心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，无法招募志愿者团队。”

一旦公益项目“断粮”，任晓媛将不得不放慢“绘制”中国水质地图的计划。

而在过去 5 年里，她发起的 MyH2O（“吾水信息平台”），已经检测记录了近 1000 个村庄的水质数据，并通过与政府、企业合作，在一些村庄落地了饮用水净化项目。

净化的水竟成一种奢侈品

一间约 6 平方米的房间里，塞满了检测设备、资料，墙面地图上用彩色图钉标注着一些位置。

“我们本来计划暑期招募十几个志愿者团队，当时就想可能拿不到捐赠资金，只能招募六七十个。”12 月 19 日，坐在房间一角的椅子上，任晓媛告诉记者。

疫情除了拖延她“绘制”乡村水质地图的步伐，还让在乡村建设净水设备的计划，变得困难重重。

而一想到前几年在农村看到的饮水问题，她便觉得这件事尤为紧迫。

任晓媛曾到甘肃一个村子调研，发现村民平时吃水用水，主要靠一个不太干净的水窖，而村民家里的桶装纯净水，只在逢年过节时用来泡茶招待客人。

“他们觉得买桶装水很贵，把净化的水当成一种奢侈品。”任晓媛颇为感触地说。

尽管她带着团队已在 7 个村庄建设净水设备，但相比水质地图上近千个村庄和社区，这个数字似乎有些微不足道。

这些天，让她觉得幸运的，不只是获得“地球卫士青年奖”，还克服困难，为村庄解决了实际的饮水问题。

“疫情逐步缓解后，我们最终争取到企业支持，幸运地筹集到项目资金。”任晓媛说。

今年 7 月 14 日，河北省晋宁县桥河东村安装了一套净水设备，村民以每桶一元的价格接水，收入由村里老人协会管理。

在那之前，家住村里的社会组织“益人社工”志愿者张哲，收集了水样寄给吾水团队。不久后，任晓媛与团队成员来到村里检测，发现一些硬度相关的指标偏高，另外由于管道损坏，饮水浊度较高。

她还在一户村民家看到，储水缸里养了两条小金鱼，用来测试水质安全，“村民觉得如果鱼不会毒



▲任晓媛。受访者供图

死，人喝了也安全”。

“前些年，村里从一口老井引水到每家每户，水喝着很咸，后来重新打了一口井，喝起来还是有咸味。而 4 块钱一桶的纯净水，村民觉得很贵。”张哲说。

据张哲介绍，村里原来只有很少的年轻人买桶装水，老人不舍得花钱，现在大多村民都已习惯了从净水设备买水喝。健康饮水的意识改变之外，村里也积累了 4000 元水费资金，后续将用在设备维护和村里公共开支。

“绘制”中国水质地图

21 岁的范星怡参与“绘制”水质地图，更多是受到疫情的影响。这个香港科技大学大三学生，因疫情留在兰州家中上网课。

今年 8 月，从高中起就热心公益的她，选择在内地参加间隔年实践，便远程申请成为“吾水信息平台”的项目负责人，通过与其他 5 名大学生志愿者“组队”，到云南丽江调研乡村水质状况。

“那个村子有 8 个自然村，用的基本都是山泉水，通过一个大蓄水池，用管道通到每户。我们当时检测了十几个指标，发现水质里有农药和生活垃圾的污染。”范星怡说。

打开“吾水地图”网页，一个个村庄的名称、位置，连接着水质数据与水安全评估，直观地呈现在眼前。

在过去 5 年，有 1000 多名青年志愿者、110 多支高校团队，参与到“乡村水质检测”项目中。他们的

没有带来什么改变。”任晓媛说。

从 2018 年起，团队通过对水质数据的分析，推动在村庄安装净水设备，保证村民喝上干净卫生的水。而这个年轻的团队走了不少弯路。最开始，他们寻找愿意捐赠净水设备的厂商，跟销售人员一同到村庄安装设备。

“销售一说话，马上开始讲这个产品有多好，感觉在劝村民赶紧买，整个做公益的氛围就变了，当地政府部门听完态度也不一样了。”任晓媛说。

团队转为寻找热心公益的企业筹集资金，再购买净水设备直接捐赠给村里。其后，再跟村里商议水的定价，制定水费收入的管理、使用计划，后续交给村两委或社区组织运营。

在近年对乡村水质的持续关注中，任晓媛也看到乡村水网硬件设施得到逐渐改善。“我们以前在宁夏一个偏远村庄调研，村里没有管网，村民还要走到很远的地方挑水。第二年再去，就发现水管已经通到村民家里。”

“正因为有政府投入，改善乡村的水网设施，我们才能更有效地解决水质问题。”任晓媛说。

目前，吾水团队利用公益筹款，帮助安徽六安、云南保山、甘肃甘谷等中西部地区的社区，接入附近管网、安装净水器或服务全村的电站，在全国建立 7 个长期的乡村水安全示范点。

然而，解决水质问题的探索，并不总会得到村民的支持。有的村民觉得，祖祖辈辈喝了上百年的水，怎么一经他们检测，就变成了有问题的水。

“很多村民最大的顾虑是，村里安装一个净水站，是不是说明村里水质不好，担心说出去影响村子的名声。”朱迪听瑶告诉记者。

自幼常跟父母回到农村老家的经历，让任晓媛在乡村实践中更“接地气”。在跟村民沟通的时候，她要求团队成员避免提及“水污染”，更多从社区健康、扶贫、提升饮水质量等角度解释。

青年志愿者团队去农村调研前，任晓媛会精心设计一场 cosplay（角色扮演）培训，由她扮演成朴实的农民，让志愿者演练入户访谈的情景。“我会换位思考，发现哪些问题问得太奇怪了，不能这样表达，再反馈给志愿者。”任晓媛说。

聊起遇到的困难，这位爱笑的姑娘坦言，经常会有无力感，但她总以青年人积极的心态应对，不断总结得失、调整方法，寻找更有效的公益模式。

对于即将到来的 2021 年，任晓媛盼望推动更多净水设备在乡村落地。“希望未来两年至少做到 40 到 50 个乡村，落地项目数量增长更快些。”

“尽管解决了几个村庄的健康饮水问题，但这还是很浅层次的事情。未来还应考虑怎么用现有的资源解决更多问题。”任晓媛说。

对于这个由青年力量组成的公益组织，任晓媛也意识到自己的局限。“靠公益组织解决乡村水质问题的效率，比不上政府和商业机构，未来希望通过更有价值的数据，推动政府部门解决问题。”